

# 传播学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及对教育传播的启示

邱婧玲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本文对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学术思想进行解读,旨在借鉴不同流派的长处,从教育传播技术、教育传播研究方法以及教育传播效果等方面揭示了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对教育传播的启示与指导意义,以促进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与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 批判学派; 经验学派; 学术思想; 教育传播; 传播绩效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A

众所周知,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依照各自的理论假说和研究方法,传播学界可以判然分为两个主要学派,即常说的“经验学派”(Experience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sup>[1]</sup>在中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中,经验学派一统天下,对批判学派的研究相对不足,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我们认识教育传播学的片面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教育传播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 一、批判学派学术思想概观

传播学批判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sup>[2]</sup>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sup>[3]</sup>纵观批判学派的发展,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其内部又分为各种流派,对其贡献最大的主要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

### 1.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等成员构成的学术团体,以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主要任务的哲学——社会学学派。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其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德裔美国著名哲学

家、美学家、政治理论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等人。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指向是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体制情境下的大众化的文化产品。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这种文化产品的特性定位为商品化、标准化、模式化和伪个性化。认为电视以“伪现实主义”的手段,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实现其心理控制工具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对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需要,由于受到了现代生产技术特别是大众传媒技术的支持,艺术品和文化用品的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复制不仅具有了可能性,而且成为了必要。所以,艺术品也就具有了标准化、批量化、同质性和齐一性的非个性的存在形式。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齐一性的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艺术品所应蕴含的自由创造本质消失了,艺术品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文化的创造变成了文化的生产。

法兰克福学者们的文化工业理论,无疑为批判学派对教育传播文化的研究开一先河。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要合理地借鉴其理论指导意义,必须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仍然有其局限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表现出了强烈的精英主义文化价值取向,其饱受人们批评的地方也在于此。<sup>[4]</sup>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极度悲观的论调。他们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天生的悲观论调,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强加给受众的

东西,着力于批判文化的物化本质,所以有人说他们的审美本质是“无望的救赎”。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不断对文化工业社会提出批判,但却没有提出一个科学的体系和建立新世界的科学方法。他们不遗余力地想砸碎这个令人绝望的社会,却没有提出通向希望的途径和方法。<sup>[5]</sup>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分析缺乏辩证的视角和眼光,显得过于片面而且形而上学。因而研究中国大众文化与教育传播不能全盘照搬其理论观点,而应该“扬弃”,合理吸收其有利的学术思想、研究思路及方法。

## 2. 文化研究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是批判学派的另一支主流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崛起对英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很快成为能够与美国主流传播学相对抗的一种替代性范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大卫·莫利(David Morley)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等。他们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霍加特和威廉斯致力于救赎工人阶级文化,而霍尔却是对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忽视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了研究,莫利和费斯克致力于在“霍尔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受众观,开创了受众研究的全新范式。

文化研究学派以双重理论范式把握和切入大众文化的双重结构,即积极性的文化理论和批判性的文化理论。<sup>[6]</sup>这两种理论范式对以往经典的单一性文化批判理论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它对大众文化理论的探索和建构使大众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范式之一的积极性的文化理论采取与法兰克福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立场,从平民主义和大众立场出发,发掘民间社会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反应,发现大众参与和对话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值得研究者借鉴。

总结霍尔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区别。首先,他抛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分析中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成分,既承认先在的社会结构对媒体的制约作用,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扩大了大众文化的内涵。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媒介权力不仅仅来自于与它如影随形的政治势力,而且也部分地来源于它自身特有的对传播信息进行编码这一特殊过程。其次,在面对各自的大众文化现实之时,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

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第三,截然不同的受众观。霍尔的研究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是铁板一块,是消极、被动的客体这一理论假设,赋予了受众主动的、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这就使他的媒介批判理论呈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向上的、对未来持更加乐观态度的氛围。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具有的超强的学科整合能力是值得大力肯定和借鉴的。我们不难看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研究中融合了很多其他学科理论,比如对于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借鉴、对于符号学理论的应用、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阐释等等,这样将其他学科的理论用于文化研究,丰富了自身文化研究理论的深刻性和可信性。

## 二、批判学派学术思想对教育传播的启示

在中国,关于传播学的研究基本上受美国经验学派的影响,走经验学派的路子,对批判学派的研究相对不足。教育传播研究中,我们需要批判学派提供一些思路、文化背景与研究方法,同时,更多地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可以而且也需要对现实大众传播与教育传播给以批判。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鉴批判学派的思想,给予我国传媒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以必要的分析,让媒介的工作人员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如何在市场导向与社会导向之间把握好平衡。<sup>[7]</sup>对于教育传播,我们更要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法,合理借鉴不同理论的长处,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学习,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用不同的策略与方法教育人。

### 1. 教育传播技术方面

从教育传播技术发展层面来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经济的联系与信息的流通使得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发达国家的通俗文化产品流向发展中国家,使处于开放体系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呈现出与自身经济发展相对独立的文化超前性;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理念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文化土壤,广告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形式超前性的代表,造成我国大众文化语境的复杂与多元,也对教育传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由于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大量的图表、图像和图形以及视频、动画、虚拟现实技术等被用于教育传播,使数据、信息和知识等的传播都实现了可视化,如概念图、虚拟演播室以

及大家熟知的 Windows 图形化界面、工具、菜单等。可视化的信息为人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大量快捷、方便、易于理解和掌握的方法和方式。在视觉文化时代,技术正体现出它越来越明显的便捷和全球流通性。

科学技术一方面帮助人们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为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合理化”的支撑,“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压抑了人的本能”。<sup>[8]</sup>正如本雅明所说:“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野蛮的史册”。<sup>[9]</sup>当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自然环境的破坏、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等都暴露了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所孕育的深刻危机。

与此类似,“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它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比如核技术、克隆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显然,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上网可以拓展视野,拓宽知识的获取途径;另一方面,网络也有其弊端。上网问题,宜疏不宜堵,关键在于正确引导,一分为二地看待网络的影响,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源,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克服了精英文化的倾向,弥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

## 2. 教育传播研究方法方面

众所周知,经验学派的研究热点在“效果”方面,而批判学派的思考重心在“控制”领域;经验主义需要借用批判学派的理论来增加自身阐释的张力,批判学派则希望用经验的方法来丰富、矫正并支持它的某些理论假设。<sup>[10]</sup>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论上的冲突所带来的融合,对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教育传播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当经验主义学派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暴力和色情等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sup>[11]</sup>在研究方法上,批判学派反对美国主流学派的经验主义和行为科学的方法,重视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需要运用批判学派的学术思想,更多地从为什么的角度进行思考,为教育提供指导,尤其在德育方面,我们要积极汲取批判学派的营养为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帮助。在批判学生创新能力不够

时,我们也更应该与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所处的学校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联系起来,不仅要指出学生的不足,还应该指出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了、应该怎样去做。比如,不少研究者做了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甚至网络犯罪对青少年危害的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我们在社会中也见证了许多青少年因网瘾、网恋、网络游戏成瘾或整天沉溺于网络而犯罪甚至杀人的典型实例。很显然,这是非常有害的,但关键在于教师和家庭如何正确引导和教育青少年正确对待网络、正确利用网络,提供具体可操作并行之有效的策略与方法,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健康成长。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都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构成的,他们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特别是以莫利开始的民族志方法论实践,把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使得媒介文化研究有了充分而又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后来的费斯克的文本解读实践更是把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之中去,比如他对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摇滚乐等等的解读,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也正是我们教育技术界应该学习的重要方法。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教育技术学的教学和传播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为教育技术学服务,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绩效。在教育技术学的相关研究中,我们更要汲取批判学派的研究长处,合理借鉴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长处,把实证和思辨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中,把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立,使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更加有效。

## 3. 教育传播效果方面

今天,学术界与理论界批判大众化通俗艺术的思想武器主要是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述。目前国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特别是批判学派理论的研究还处在一个翻译、解读与引介的阶段,主要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不少研究者的误区在于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对西方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忽略了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独特的本土语境。<sup>[12]</sup>

许多批判学者认为,媒介的力量是强大的,就像子弹射向靶子,靶子就会应声倒下;而大多数经验学者却认为,媒介的直接效果往往是极其有限的。批判

学派的实质是强调哲学思辨,它重点研究传播的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初的理论基础,主要关心谁控制大众传播体制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对有限效果论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产生了“宏观效果理论”。宏观效果理论认为,有限效果论只考察了具体传播活动的短期效果,而忽略了整个传播事业日常的、综合的报道活动所产生的宏观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在认知、态度和行动这三个效果层面上,有限效果论充其量只探讨了后两者而忽视了更早的阶段——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在对有限效果论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称为“新效果理论”的模式或假说。其中包括美国传播学家 M.E.麦库姆斯和 D.L.肖“议程设置功能”假说,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 Noelle-Neumann)的“沉默的螺旋”假说,美国学者格博纳的“培养分析”,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的“知识格差”假说,英国学者霍尔的“编码与译码”研究等等。

“新效果理论”在各国传播学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借鉴“新效果理论”的观点,在教育信息传播中,我们更应该强调教育传播的全面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宏观的传播效果,广泛运用信息化教学技术与手段,正确认识教育传播影响的有力性,在实践教育传播的各种实际目的和效用时,让技术负载更多的价值理性与人文内涵,让教育传播实现真正的传播绩效。

#### 4. 教育传播媒介方面

西方的批判学派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媒进行批判,而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大众传播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如果刻意地回避、掩盖这些问题是不利于我国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发展的。<sup>[14]</sup>批判学派对电视的同一化、庸俗化与极权化进行了批判,使我们在思考电视对我们生活和工作、学习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思考其对我们尤其是对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当我们对教育传播媒介进行专门研究时,有必要将其与所处的社会大系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无疑是在对批判学派理论进行梳理时得出的重要启示之一。

当今,批判学派的探讨为经验学派提供了若干可资思考的问题,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主的研究人员不应忽视生产与传递信息的传播体制的性质。无论谁拥有和控制这个体制以及这个体制运作的目的,都是研究传播相关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直接有助于效果调查。经验学者在研究传播过程时不应忽视道德因素,即使他们不能用他们经常采用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道德因素。

合理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思路,既要重视社会结构对教育传媒的制约作用,又要注意到教育媒介组织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以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而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对教育传播展开深入而科学的研究。

总之,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争论本身就标示出既有存在又有超越,而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两者内,在张力的驱动下不断前行的。归根结底,无论是批判学派还是经验学派,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范式,而且每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我们要合理借鉴不同学派的优势与长处,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使传播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以促进教育传播学的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1] [美]罗杰斯.传播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与交融[J].王怡红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51~58.
- [2] 李彬.批判学派纵横谈[J].国际新闻界,2001,(2):64~70.
- [3]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9~41.
- [4]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47.
- [5] [12] 刘然.批判学派大众文化理论视野中我国广告文化语境解读[D].南宁:广西大学,2006.5~30.
- [6] 任婕.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的研究报告[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21~26.
- [7] 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J].国际新闻界,2002,(2):52~54.
- [8] [德]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9] 陈永国.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0] 梅琼林.方法论: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134~140.
- [11] 陈力丹.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J].新闻传播与研究,2000,(2):33~38.
- [1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4.
- [14] 徐姗姗.批判学派视野中的电视媒介[J].高等教育,2006,(1):35~36.